

结构变迁视阈中的安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研究

罗一斌 郑 峰 董津津

【摘要】面对深刻的内外部环境变化，安徽经济增长需要新的动力。以往研究缺乏一个思考安徽经济增长动力的结构变迁视角。基于供给、需求、产业三大结构分析，发现安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结构特征表现为：投资和出口动力衰退，消费动力日益强劲；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供给趋紧，创新供给日益强劲；农业和工业动力衰减，服务业动力日益强劲。但是，安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面临居民消费增长乏力、创新要素供给不足、服务经济相对滞后三大阻力。为促进安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正常进行，特提出“提升城乡居民消费能力+提升创新要素供给能力+提升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结构变迁；动力转换；安徽省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794（2018）04—0014—05

经济增长是经济研究的核心主题。当前，安徽经济增长的内外部环境均已发生深刻变化。一是国际市场需求疲软危机，二是内需不振危机，三是三十多年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严峻的环境与资源危机，四是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危机。同时，安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现代化强省的关键期。因此，如何应对上述四大危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当务之急。在此背景之下，一些学者借鉴古典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剑桥增长理论，对以往的经济增长指导思想及实践进行反思，挖掘安徽省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动力。李富强等^[1]、韩其恒等^[2]对制度及其质量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程霞珍^[3]、周鹏等^[4]、王哲等^[5]、张亨明^[6]分别利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误差修正模型和Weaver—Thomas模型研究了重工业、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朱学星等^[7]对消费和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进行了协调检验；高月梅等^[8]对教育财政支出的作用进行了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封永刚等^[9]基于生产函数模型检验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朱子云^[10]分析了要素配置效率及产业间要素配置结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李云等^[11]探讨了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上海小三线建设对皖南经济增长的作用。吕连生^[12]基于后发优势理论探讨了促进新常态下安徽经济发展的劳动力、自然资源、技术和制度四大后发优势。综观已有研究成果，发现他们都立足于成熟的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检验制度、产业选择、出口、要素配置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少量也涉及到区位、历史联系及后发优势的作用，缺乏一个思考安徽经济增长动力和新增长点的结构变迁视角，缺乏对安徽省域资源、制度禀赋特征的考虑。为弥补这一研究缺陷和提供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本文基于结构变迁视角，对安徽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进行探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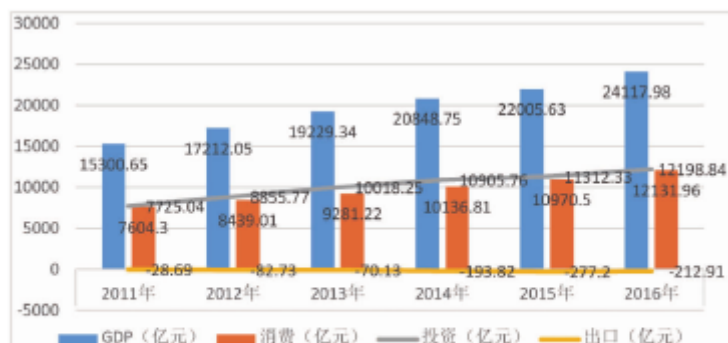
一、安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结构特征

经济学者一般从供给、需求、产业等层面来探讨一个地区（国家）的经济增长情况。这些层面的结构变迁则给经济增长带来不同的动力。在向经济新常态的转换过程中，安徽经济增长正面临着一系列的动力结构转换和调整。总的来说，这次变革显示出三个特征：一是从需求动力结构变迁来看，出口和投资动力衰退，消费动力日益强劲；二是从供给动力结构变迁来看，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供给趋紧，创新供给日益强劲；三是从产业结构变迁来看，农业和工业动力衰减，服务业动力日益强劲。

（一）投资和出口动力衰退，消费动力日益强劲

作者简介：罗一斌，滁州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博士；郑峰，董津津，滁州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安徽滁州239000）。
基金项目：滁州学院科研启动基金项目（2016qdl4）
收稿日期：2018—04—11

从改革元年至“十一五”末期，投资是安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由安徽省统计数据可知，投资从 1978 年的 24.02 亿元增加到 2010 年的 6171.54 亿元，年均增长速度为 18.93%；出口从 1.19 亿元降低到 2010 年的 -25.36 亿元，年均增长速度为 -9.71%。这一时期的 GDP 年均增长速度为 15.26%。由此可知，安徽省投资的年均增长速度比 GDP 年均增长速度快 3.67 个百分点，出口呈负增长趋势。消费从 1978 年的 88.75 亿元增加到 2010 年的 6213.15 亿元，年均增长速度为 14.20%。^{[13] 29} 不难看出，消费的年均增长速度比 GDP 的年均增长速度要慢约 1.06 个百分点。从这一时期“三架马车”的表现情况来看，投资强劲增长，消费缓慢增长，出口负增长。投资在 GDP 中的占比由 1978 年的 21.08% 增长到 2010 年的 49.93%，消费由 1978 年的 77.88% 降低到 2010 年的 50.27%，出口由 1978 年的 1.04% 降低到 2010 年的 -0.21%。上述数据表明，投资的强劲增长是驱动安徽自改革元年至“十一五”时期经济快速增长的决定性力量。



注：图中数据来源于《安徽统计年鉴》(2011—2017)。

图 1 安徽“十二五”以来的经济增长动力

“十二五”时期，国际国内经济环境的巨大变化导致安徽省的投资和出口动力日渐衰退（见图 1）。在国际上，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交互影响，加剧国际恐慌；在国内，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长速度由高速转向中高速，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逐渐深入。安徽统计数据表明，2011—2016 年，投资从 7725.04 亿元增长到 12198.84 亿元，年均增长速度为 9.58%，与这一时期的 GDP 年均增长速度持平。出口从 -28.69 亿元减少至 -212.91 亿元，年均降低率为 -49.31%。消费从 7604.30 亿元增长到 12131.96 亿元，年均增长速度为 9.86%，比同期 GDP 年均增长速度高 0.28 个百分点。^{[13] 31} 在这一时期，消费在 GDP 中的占比由 2011 年的 49.7% 增长到 2016 年的 50.80%，投资和出口在 GDP 的占比则各自由 2011 年的 50.49% 和 -0.19% 减少至 2016 年的 50.08% 和 -0.88%。上述数据反映出，自“十二五”以来，消费对安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增强，投资和出口的促进作用逐渐减弱。

（二）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供给趋紧，创新供给日益强劲

从改革元年至“十一五”末期，安徽经济发展走的也是一条典型的“要素驱动型”道路，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出现了大规模扩张。人口普查统计数据表明，安徽省适龄劳动力（即 15—64 岁）数量从 1982 年的 2968.5 万人增加到 2010 年的 4284.0 万人，增加了 1315.5 万人；适龄劳动人口在年末总人口的占比从 59.8% 增加到 72.0%，增长了 12.2%。^{[13] 43} 国家统计局年鉴数据表明，1990—2010 年间的安徽总储蓄率平均值为 31.24%，远高于中西部省份，甚至还超过了少数东部沿海省份，金融机构存款总额由 1978 年的 33.8 亿元上升到 2010 年的 16366.1 亿元，年均增长速度为 21.31%，远快于同期的 GDP 年均增长速度；FDI 也出现了快速增长，由 1990 年的 0.09 亿美元上升到 2010 年的 50.14 亿美元，增长了 556 倍，年均增长速度为 37.18%，远远高于同期 GDP 的年均增长速度。^{[14] 459} 国土资源部数据表明，从 1980 年到 2010 年期间，安徽城镇建设面积由 898.5 万平方米增加到 23295.69 万平方米，增长了 25.93 倍，年均增长速度为 11.46%。^[15] 国家能源统计数据表明，从 1991 年到 2010 年，安徽省能源消费总量由 2910.52 万吨增长到 9414.0 万吨标准煤，增长了 3.23 倍，年均增长速度为 6.37%。目前，能源消费总量的大增导致安徽省的能源对外依存度已达 16.8%。^{[14] 375} 可以说，自改革开放以来，是生产要素的大规模投入驱动了安徽经济的快速发展。

自“十二五”规划以来，安徽经济发展的“要素驱动型”模式难以为继。从劳动力要素供给方面来看，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安徽适龄劳动力数量已出现减少趋势。这一趋势导致劳动力价格直线上升。如2011年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已为29539元，2016年就直线上升至50976元，年均增长速度达11.59%。^{[13] 183}从资本要素供给方面来看，由于对预期投资回报率的不看好，FDI增速出现回落。安徽2011年的FDI数量为112.56亿美元，到2016年也只有147.67亿美元，年均增长速度只有5.54%，低于同期GDP的年均增长速度。^{[13] 721}从土地要素供给方面来看，商品房建设用地越来越稀缺，土地价格急剧上升，导致土地购置面积出现下降现象。住建部数据表明，安徽2011年的土地购置面积为44327.4万平方米，而2016年下降为33383.03万平方米；商品房土地成交款却从2011年的8894.03亿元增长为2016年的10019.88亿元，土地成交价格连年上升，高于同期GDP的年均增长速度，年均增长速度达14.37%。^[16]从能源要素供给方面来看，安徽能源需求量激增，导致能源对外依存度持续上升，能源价格持续上涨。

随着资源禀赋的演变，安徽经济增长必须抛弃以往的“要素驱动型”模式，进入转型发展新阶段，选择“优质高效型”模式。从宏观层面来看，“十八大”和“十九大”报告都连续强调创新驱动型模式；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李克强总理倡导“大众创新”模式。从微观层面来看，安徽各类企业也在大力投资科研，增强企业创新能力。这些情况无一不表明，创新供给将成为驱动安徽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动力。

（三）农业和工业动力衰减，服务业动力日益强劲

从产业结构层面来看，自改革开放元年至“十一五”末年，工业是驱动安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同时，安徽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也是安徽实现工业化的历史进程。统计数据表明，安徽农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持续下降，已从1978年的41.78%下降至2010年的13.99%；工业在GDP中的占比已从1978年的35.55%增加到2010年的52.08%；第三产业在GDP中的占比已从1978年的17.27%增长到2010年的33.93%。^{[13] 24}虽然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占比在逐年上升，但工业占比一直要高于第三产业占比。在这一时期，工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19%，工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一直超过第三产业的贡献率。工业是安徽第二产业的主体，处于绝对支配地位。因此，自改革元年以来，在安徽服务业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进程中，安徽工业发挥了主要动力的作用。可以说，是安徽工业的快速发展在带动着安徽经济的快速增长。

自“十二五”规划实施以来，安徽第三产业步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安徽统计数据表明，在2011—2016年期间，安徽第三产业在GDP的所占比重持续上升，由32.52%增长到41.30%，年均增长速度为4.90%（见图2）。虽然第三产业的年均增长速度要比GDP的年均增长速度要慢，可比工业的年均增长速度要快。特别是在2016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首次超过了第二产业。这意味着第三产业在安徽经济结构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为了主导产业。与此同时，第三产业对安徽GDP增长的贡献率也从2011年的26.57%增长到2016年的50.78%。2016年，第三产业的贡献率也首次超过了第二产业。^{[13] 22}服务业增加值在GDP中占比上升是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须产物。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根据服务经济学的观点，如果一国或地区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超过50%，则意味着该国或该地区进入了服务经济时代。可以说，安徽已进入了服务经济时代。这意味着，安徽经济发展的服务业动力已处于主导地位。日益强劲的服务业动力将决定着安徽经济发展的未来趋势。



注：图中数据来源于《安徽统计年鉴》(2011—2017)。

图2 安徽“十二五”以来的产业结构演变

二、阻碍安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主要因素

虽然上述数据说明安徽经济发展的传统动力已逐渐衰减，新兴动力日益明显。但是，我们还需要注意安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过程中的诸多阻力因素。如果处理不好，会极大增加安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成本。从需求、供给和产业三个层面来看，这些阻力因素主要有三：

（一）居民消费增长乏力

经济学将消费分为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两大部分，其中居民消费占主体地位。由于特殊的城乡二元体制结构约束，我国居民分为城市和乡村居民两部分。因此，居民消费增长是指城乡居民消费的增长。自“十二五”规划实施开始，消费对安徽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虽日益增强，但城乡居民消费增长乏力。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城乡居民消费能力不高。由于收入分配改革滞后，导致国家和企业在初次和再次分配中所占比重过大，挤压了城乡居民的收入份额。这导致城乡居民消费能力增长受到制约而难以持续增长。二是城乡居民消费倾向不高。由于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不完善，城乡居民增加了风险预防性储蓄，而降低了消费倾向。三是城乡居民消费环境不佳。当前，我国在促进消费的金融消费支持、消费者权益保护和食品质量安全管理等消费环境还存在许多改善的地方。并且消费环境的改善不可一蹴而就。

（二）创新要素供给不足

自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创新”思想以来，创新便成为理论界、决策层和实业界的关注焦点。创新是一个国家持续兴盛的动力源泉。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范围内已发生了四次科技革命，科技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在安徽“调结构、去库存、补短板、促发展”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创新管理制度供给不足。创新管理制度供给不足，导致目前的创新管理出现了多头管理、条块分割、效率不高等问题；科研项目实施无组织现象比较严重；科研项目立项重数量、结题重人情关系。这些不良现象的存在导致安徽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二是创新资金供给不足。因为科技创新投入体制建设不健全，安徽创新资金供给不足。安徽统计数据表明，2011年至2016年期间，安徽创新资金投入占GDP的最高比重为1.54%，^{[13] 812} 低于同期国家创新资金投入比重（见图3），^{[14] 1032} 更远低于国外发达地区的创新资金投入比重。三是创新环境供给不足。创新离不开一个优良的创新环境。当前，由于多种原因，安徽和我国的科技创新活动存在剽窃和造假、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过弱等现象。这些现象导致科技创新融资难度大、创新积极性不强。



注：图中数据来源于《安徽统计年鉴》(2011—2017)和《中国统计年鉴》(2011—2017)。

图3 “十二五”以来安徽和我国的创新投入占比情况

(三) 服务经济相对滞后

“十二五”期间，安徽服务业获得了较快发展。其主要内容表现为传统服务业（即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现代服务业（即生产性服务业，主要包括物流业、信息服务业、商务服务）所占比重较低，发展相对滞后。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服务业管理体制相对滞后。目前，安徽服务业管理体制存在不灵活、政出多门、成本过高等问题。由于生活、生产水平的提高，现代服务业内容与种类日益增多，新业态不断涌现。这要求政府的服务业管理体制增强柔性，以适应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趋势。二是高端服务业要素相对缺乏。安徽目前的服务业要素主要集中在传统、低端生活服务业，缺乏满足现代生产服务业发展需要的高端人才和服务标准。如安徽在大力打造“合芜蚌”高新开发区，融入“一带一路”战略。可高端国际贸易服务人才和高级智能设备技术人才极度缺乏。三是服务业融资发展相对滞后。在安徽现代服务业发展进程中，中小型科创企业居多。由于中小型企业存在创建时间短和存续时间短两大特征，使得各大银行缺乏投资兴趣。因此，融资发展相对滞后成为制约安徽中小科创企业发展的瓶颈。

三、促进安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对策建议

实现持续健康发展，是安徽经济发展的核心目标。鉴于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基于对安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结构的特征和阻碍因素分析，特提出“提升城乡居民消费能力+提升创新要素供给能力+提升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对策建议，以期促进安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正常进行。

(一) 通过“提、优、改”措施来提升城乡居民消费能力

影响城乡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有消费环境、可支配收入水平和消费倾向等。消费能力提升，不仅指消费量的增长或者消费规模的扩大，还包含消费质量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高水平化。提升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突破。一是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由其收入水平决定。因此，要提高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必须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安徽省可出台更有力度的增加收入政策，扶持就业创业，加快城乡收入分配结构、行业收入分配结构、初次与再次分配结构的优化调整，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和宅基地制度改革。这样就能切实提高居民收入，解决城乡居民“有钱花”的问题。二是优化移动支付环境。移动支付已成为当前消费环境的重要特征。我们应充分利用“互联网+”渠道，建设各类电商消费平台，加大消费金融支持力度，完善消费金融产品监管制度，加大消费者信息隐私权保护力度。这样一来，就为广大的城乡消费者提供快捷、安全的消费环境，解决了城乡居民“钱怎么花”的问题。三是改善社会保障，提高城乡居民消费倾向。目前，由于社会保障的不完善和低水平，城乡居民普遍存在较高的不敢消费倾向。这会导致较高的社会储蓄，从而制约消费。要让城乡居民大胆放心地消费，必须完善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提高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这样一来，就解

决了城乡居民“钱不敢花”的问题。

（二）通过“健、加、优”措施来提升创新要素供给能力

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在于，通过创新要素的投入，加快科技革新和管理水平提升，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生产质量。提升创新要素供给能力，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突破。一是健全创新管理制度。主要是加强创新管理体制变革，去掉条块分割、效率低下和多头管理的弊病，增强创新管理体制的激励作用；增强科研项目管理的组织化水平，明确各科研单位的职责与科研项目的过程管理；加强科研项目立项与结项管理，去掉人情关系立项与结项，只重数量不重质量的问题。二是加大创新资金供给。安徽省政府可出台政策，明确规定政府研发投入在GDP中的占比不能低于3%，提高科研投入量和使用效率在各级政府考核中的比重。同时，加强对社会资本对研发的投入管理，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创新。三是优化创新环境。安徽省可出台科研诚信管理制度，加大对科研不端行为的惩戒力度，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加大各类科创中心建设，促进产教融合，完善科创小微企业融资支持政策等措施，全面优化创新环境，把安徽打造成为创新高地。

（三）通过“调、加、提”措施来提升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

现代服务业相对于传统服务业而言，处于价值链的高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既能优化安徽产业结构，又能扩大居民消费，为安徽经济增长插上腾飞的翅膀。提升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突破。一是调整服务业管理体制。这要求政府根据现代服务业的新业态，发展新趋势，调整服务业管理体制，增强服务业管理体制的柔性，降低管理成本。同时，围绕安徽“三个强省”目标，根据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战略和“一带一路”战略精心规划现代服务业发展政策，引导现代服务业发展。二是加大高端服务业标准建设力度。加大安徽现代服务业开放度，引入、学习和改进国际现代服务业标准。根据产教融合政策，出台政策引导安徽各高校以现代服务业发展为中心，开展高端服务业标准科研。如加快智慧养老服务标准建设，智慧家居服务标准建设，智能社区标准建设等。三是提高现代服务业融资水平。可创建区域性现代服务业金融支持机制，满足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融资需求。如设立高端服务发展专项资金、提供贴息贷款和创新补贴等，以鼓励现代服务业发展。也可出台相关社会融资政策，鼓励社会资本进入现代服务业。

四、结论

随着内外部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传统经济增长动力已失去效力，安徽经济增长正面临着一系列的动力结构转换和调整。从需求、供给和产业三个层面来看，安徽经济增长动力的变化显示出三个特征：一是从需求动力结构变迁来看，出口和投资动力衰退，消费动力日益强劲；二是从供给动力结构变迁来看，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供给趋紧，创新供给日益强劲；三是从产业结构变迁来看，农业和工业动力衰减，服务业动力日益强劲。新兴动力虽已日益明显，但我們需要注意动力转换过程中的居民消费增长乏力、创新要素供给不足、服务经济相对滞后等三大阻力因素。如果处理不好，会极大增加安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成本。为促进安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正常进行，需要从提升城乡居民消费能力、提升创新要素供给能力和提升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三个方面着手进行应对。

参考文献

- [1] 李富强，董直庆，王林辉. 制度主导、要素贡献和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的分类检验 [J]. 经济研究，2008（4）：53—65.
- [2] 韩其恒，李俊青，刘鹏飞. 要素重新配置型的中国经济增长 [J]. 管理世界，2016（1）：10—29.

- [3] 程霞珍. 安徽服务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J]. 企业经济, 2011 (4): 121—123.
- [4] 周鹏, 胡凯. 安徽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研究 [J]. 华东经济管理, 2013 (3): 25—28.
- [5] 王哲, 杨桔. 基于熵权法和Weaver—Thomas模型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评价与选择研究——以皖江城市带为例 [J]. 科技管理研究, 2015 (20): 84—90.
- [6] 张亨明. 皖江城市带文化创意产业空间集聚推进模式研究 [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5 (4): 109—114.
- [7] 朱学星, 朱云鹃, 于阳. 安徽省经济增长驱动因素的实证研究 [J]. 技术经济, 2012 (1): 91—94.
- [8] 高月梅, 殷功利, 叶新平. 安徽教育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J]. 统计与决策, 2012 (7): 150—151.
- [9] 封永刚, 蒋雨彤, 彭珏. 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分解: 有偏技术进步与要素投入增长 [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7 (9): 39—56.
- [10] 朱子云. 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与政策选择 [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7 (3): 3—20.
- [11] 李云, 杨帅, 徐有威. 上海小三线与皖南地方关系研究 [J]. 安徽史学, 2016 (4): 158—165.
- [12] 吕连生. 新常态下安徽如何发挥后发优势 [J]. 江淮论坛, 2016 (1): 53—58.
- [13] 安徽省统计局. 安徽统计年鉴 (2011—2017) [EB/OL]. http://www.ahthjj.gov.cn/tjjweb/web/tjnj__view.jsp?str-CollId=13787135717978521&__index. 2018年5月20日查询.
- [14] 中国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 (2011—2017) [EB/OL]. <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 2018年5月20日查询.
- [15] 中国自然资源部. 土地数据 [EB/OL]. <http://old.mlr.gov.cn/bsfw/xxfw/>. 2018年5月20日查询.
- [16] 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建设统计年鉴 [EB/OL]. <http://www.mohurd.gov.cn/xytj/tjzljshxytjgb/index.html>. 2018年5月20日查询.